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 调查研究(1928-1932)

孙 波

【摘 要】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创建工农红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至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利用多种情报渠道对红军的兵力结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策略等进行了广泛调查。这些调查分析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理清了红军与中共的关系,预判了红军的发展趋势,供其制定对华政策时参考。日本通过上述调查,认识到红军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必然。

【关键词】日本外务省;驻华领事馆;红军;情报调查

【作者简介】孙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2022.2.86~10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关系研究(1901-1945)”(20CZS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为反抗国民党血腥镇压,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一支人民军队。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红军”。^①1928年至1932年间,以湘赣闽、鄂豫皖、湘鄂西为主,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苏区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中共与红军不断遭到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围剿”“征讨”,陷入一时苦战。红军的革命军事活动及发展态势由高潮进入低迷,复又由低迷转入高潮,最终形成星火燎原之势。^②到1933年,全国红军总兵力发展到284687人,尚不含地方部队及26个独立师团和1个游击大队。^③日本政府在“扶蒋反共”的方针下,高度警惕中共和红军的发展。^④外务省是日本军、官、民、学一体化对华情报调查体制的重要组成,也是日本攫取红军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⑤自1928年始,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展开深入调查,搜罗了大量中共相关军事情报,为日本政府掌握红军动态、预判红军动向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⑥

目前学界有关日本对红军调查的研究,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为时间节点,将涉及红军的内容

置于中共武装斗争的范畴加以剖析,^⑦或考察日本馆藏档案中有关红军建军过程、红军性质的内容。^⑧日本学者倾向于考察农村革命时期部分根据地的红军发展状况。^⑨总体而言,学界缺乏对1928-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情报搜集工作、内容及认识等方面的系统考察。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经过多方调查,如何认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对于情报中红军军事活动与武器装备,又有何种认知与评介?此外,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主要有哪些情报来源,所搜集到的情报又呈现出哪些特点?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支那各地共匪关系杂纂》(第一卷—第八卷)、外务省情报部编《支那共产党史》^⑩、陆军调查班编《支那的共产党活动》^⑪、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⑫及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⑬等为史料依据,在日文外交档案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考察1928-1932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情报调查和认识过程,还原日本窥探红军动向、警惕红军发展的历史史实,从侧面揭示红军走向革命胜利的历史

必然。

一、关于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关系的调查研究

1928年至1930年,日本对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秉持怀疑态度。由于仅掌握一些零星情报,未形成有力的证据链以证实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具有关联性,日本曾一度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传闻而已。1930年以后,日本外务省与驻华领事馆历经几番调查,广罗情报,才逐渐明确了它们的内在关系。

1930年4月24日,广东总领事代理须磨弥吉郎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军进入粤北边界南雄、始兴、仁化一带。该报告中称,“根据当地日本居留民提供的情报,获悉朱毛红军中约有7、8名俄国共产党员。朱毛红军与官兵(14)激战之后,战场遗留数具俄国共产党员尸体”,并且获知,“俄国共产党员在香港的罗宾逊大街(Robinson Road)36号设有办事处,专门负责同朱毛红军进行联络”。^⑤广东总领事馆提供的这份情报,使日本政府了解到红军与苏俄的确存在联络关系,并得知二者的联络管道。然而仅凭该情报,日本无从知晓这种联络关系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无法判断红军是否接受来自苏俄或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

上海总领事馆搜集到的情报与此相似,并对红军接受外国援助一事持否定态度。8月22日,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向外务省提交《支那共产军及苏维埃区域情况》调查报告。对于“红军是否接受苏俄援助”问题,重光葵在报告中表示,“目前无从知晓。只听闻今年3月广西龙州红军第七军举行暴动,其间4名俄人遭国民政府逮捕并被枪杀。目前无法确定这4名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重光葵还认为,“就红军接受外界弹药补给之事,尚无确凿证据。恐怕共产国际对红军并无过多奢望,故未制定任何计划以对其施加援助”。^⑥上海总领事馆的情报也只能说明红军与苏俄存在联系,但无法证实红军是否接受苏俄或共产国际的援助。上海总领事馆推测,共产国际并不看好红军发展前景以至于根本没有制定相应援助计划。

日本外务省迫切希望明确红军与苏俄联系的内

情,责令各驻华领事馆尽快查明红军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经过数月的情报搜集,广东总领事馆率先探明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来往细节。9月12日,广东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从共产国际派遣指导员、军费资金援助、枪支弹药供给等方面,梳理了中共自成立到组建红军期间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实情。报告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介绍共产国际的马林赴桂林北伐军总司令部拜会孙中山,劝说孙中山为实现北伐同共产党合作,为“容共”政策打下基础。随后,蒋介石访苏,鲍罗廷抵粤。1925年6月,中共领导人苏兆征在鲍罗廷、陈独秀协助下,成立了领导20万工人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质上等同于成立了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蒋介石在南昌宣布不承认武汉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声明解雇并驱逐鲍罗廷。这期间,中共一直接受苏俄方面的物资及资金援助。鲍罗廷的离开表面上制造出一副中共已同苏俄断绝关系的假象,而实际上是支持鲍罗廷一派所采取的新战术。为抵制国民党日益军阀化,中共方面策划领导全国范围的工农武装暴动,并将暴动推向新的高潮。1927年12月11日,广州^⑦爆发的暴动是在苏俄总领事馆馆内策划实施的。当时知晓暴动计划的有5、6名苏俄人(其中1人为使馆副领事),事发之后均被枪决。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30年3月,红军与国民党部队在陆丰城郊发生激战,红军战死者中发现一具俄人尸体。根据前海丰县长陈祖贻提供的情报,朱毛红军中有7、8名俄人活动,他们借助无线电信设备,直接同苏俄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此外,苏俄每年向朱毛红军给付20万元的军费及物资。彭德怀领导下的红军部队在占领长沙之前,就已获得来自苏俄方面40万元的资助。共产国际则向香港、广东、海陆丰支部分别给付14500元、8000元、3000元的活动经费。^⑧共产国际支部驻地经常变动。共产国际方面目前有15-16名俄人潜藏在澳门开展活动,以澳门作为根据地,便于在必要时前往香港等地执行任务。广东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当局认为中共与苏俄之间不存在联系,所谓秘密接触只是共产党的某种宣传策略。广东总领事馆并不赞同国民

党当局看法,认为中共及红军与苏俄一脉相承,苏俄、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海陆丰县的红军提供了包括武器在内的实质性物资援助以及军费资助,且共产国际特别委派10余名军事指导员奔赴战斗前线指挥红军作战。^①

几乎与广东总领事馆报告同步,1930年9月26日,宜昌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也证实辖区内红军与苏俄存在确切联系,并接受苏俄军事援助。报告中谈到,根据当地警备司令部郭郎的确切消息,苏俄向贺龙部队提供军费支持,且该军费几经周折,最终由上海转送至贺龙手中。^②

9月30日,汕头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同样证实了红军与苏俄存在关系,但否认二者之间存在援助事实。^③汕头领事馆认为,辖区内潮梅红军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虽存在联系,但并无军事性援助。汕头领事馆从国民党第六十二师参谋长叶敏予处获悉,目前红军古大存部中有2、3名俄人,尚不清楚承担何种任务。由于当地宪兵在海岸线一带防守森严,潮梅红军的补给、物资、军费只能自行解决。因此,汕头领事馆判断,纵使潮梅红军武器、弹药极度缺乏,也不可能从苏俄国内获得直接补给。

综合广东总领事馆、宜昌领事馆及汕头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日本已然能够证实红军与苏俄存在联系,且有进行军事性援助的事实,只是这种援助存在地区性、地域性差别。日本十分关切红军与共产国际的具体联系情况。随后,几份关于红军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报使日本大为震惊,因为这些情报显示红军与日本也存在某种关联。

南京领事馆接到朝鲜总督府警务局转送的共产国际远东军事委员会援助红军的情报,并于10月2日呈报给外务大臣原喜重郎。该情报由朝鲜总督府驻上海派遣员搜集而来。情报显示,8月上旬活跃在赣、湘、鄂三省的红二、三、四、五、八军,向共产国际汉口支部提出军费援助及派遣军事指挥人员的请求。汉口支部随即上报共产国际远东军事委员会。共产国际召开部长会议,认为当前有必要乘势扩大红军规模,决议向红军先行提供50万元军费并指派军事指导员赴华。其中,就军事指导员派遣工作进行补充说明,因俄籍军事指导员外貌、体征过于明

显,容易暴露身份,特别选派多年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从事军事训练的冈田大佐、佐野少佐等4名日籍军事指导员前往红军内部。^④依据该情报,日本掌握了共产国际远东军事委员会对红军的军事援助内情,而且惊讶地发现协助红军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竟然还有日本人。

1931年2月19日,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收到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呈送的情报。该情报证实,数名日籍军事指导员在红军军中工作,且协助红军筹措军火,“红军彭德怀、黄公略部队的随军参谋、军事指导员日本人野口少佐去年离开军队前往青岛,1月19日与亲戚酒井一同返沪后,在胡文江、郑若谷协助下,潜伏在上海法租界徐家汇。酒井从中共要人郭颂平处领取汉口方面提供的经费18000元,随后与郭共赴内地。他们筹划在汉口、长崎设立一个大型公司,接受红军各军的军火订单,为红军调度武器弹药”。^⑤

日本由此得知,受共产国际的指派,确有数名日籍军事指导员在红军中协助指挥作战。而且,日籍军事指导员曾暗中联合日本“共产分子”、左翼人士密谋在长崎成立公司,为红军筹措武器,驰援中国革命。为进一步肃清日本国内共产主义“残余”、维持法西斯统治,日本政府坚持奉行反共政策,遏制共产主义思潮蔓延,严格取缔相关团体组织,残酷镇压共产革命力量。

上述有关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情报,其调查对象主要是活跃在中国南方的红军。1930年11月17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寄送题为《近期共匪的形势与中国前途的危机》调查报告,首次言及中国北方地区中共武装力量接受苏俄援助的相关情况。报告指出,中共在外蒙古^⑥的政权、军事组织的指挥权,包括红军在外蒙古的一切军事活动,均受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支配。报告将东北分为“北满”“南满”两地区进行论述,“北满”地区以中东铁路为军事重心,苏俄通过铁路向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运输必要物资;“南满”地区以朝鲜共产党力量为主,由中共直接提供武器、装备支持。长沙领事馆认为,外蒙古、“满洲”尚不是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红军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湘鄂赣地区的红军会合后,正积极联系川东、

豫南、粤北、闽西、浙西、皖北、苏北地区的红军，力求实现长江流域的完全“赤化”。^⑤

长沙领事馆的情报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红军活动较少，中共的武装力量相对薄弱。中国北方红军具体情况及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成为日本情报信息的空白区域。而日本驻长江以南的领事馆所能掌握到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区红军及中共武装力量与苏俄关系的情报又极其有限。这种状况严重掣肘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

因此，从1931年初开始，外务省明确作出指示，要求“北支”各领事馆加紧搜集相关情报。2月17日，天津总领事馆警察署从当地共产党组织手中截获一份印有“中共中央公布”字样的《赤色军及赤色团体组织表》，总领事代理田尻爱义立即将该表转呈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⑥在田尻爱义报告中，有关“赤色军组织”的部分，红军的全称被标注为“国际军中国红军”，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为“国际军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总指挥部”，红军中所设政治委员接受书记部指示行事，书记部又受共产国际领导。天津总领事馆据此认为红军具有国际属性，是国际军在中国区域的一个分支，红军同苏俄、共产国际联络恰好是国际化军队的性质表现。报告中的“赤色团体组织”部分显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设书记部，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组织全称被标注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所有组织统一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包括中共党部、青年团中央、中华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革命互济会、左翼文艺作家联盟、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反基督教大联盟、自由运动大联盟。结合前述内容，天津总领事馆判断，红军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或受共产国际强势影响。

4个月以后，天津总领事馆警察署再次获得一份有价值的谍报，即“苏俄对华军事方略”，其中详细阐述了苏俄对中国北方红军的军事援助详情。1931年7月1日，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将“方略”呈报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大致内容如下：(1)苏俄从外蒙古苏维埃区域以北阿钦斯克、库伦(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向中国北部运送各种武器及宣传品；(2)苏俄训练外蒙古军队，并为其提供坦克、飞机及其他新式战斗武器装备；(3)苏俄对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共人员进行

军事性整编，一旦发生战事，立即在东北发起暴动驰援苏俄；(4)苏俄向西伯利亚东部的贝加尔、黑龙江、沿海各地增派两个军团加以部署，以威慑“北满”境域；(5)苏俄继续对中国南方各省红军进行资金援助，鼓励红军进攻各级政府机关，推翻国民党政权，在不久的将来与苏俄红军携手，共同抵御帝国主义进攻。^⑦根据“方略”所提供的情报，日本明确了苏俄同红军，尤其是北方地区红军的联络状况、援助实情以及军事计划、战略意图等，在关注南方红军的同时，将目光扩展至北方地区红军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之上，为之后制定和实施侵华策略提供了参照，成为其制造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参考依据。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东北地区中共、红军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关乎日本的切身利益。因此，外务省尤为关注东北地区中共与红军的动向。1932年5月20日，外务省亚细亚局汇总各驻华领事馆所提供的情报，编纂了《近期中国共产运动的概况》调查报告。^⑧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地区中共与红军、苏俄、朝共及日共活动情况：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奉天迁往哈尔滨，联络“马贼”、反政府军，领导红军在“北满”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苏俄为牵制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于4月12日炸毁中东铁路、袭击日军列车，秘密计划引爆鸭绿江、大同江、清川江上的铁轨；数名朝鲜共产党员正隐匿在“南满”各处伺机行动；日本共产党在大连成立满洲事务局，组织在满日本人劳动组合协议会，计划在抚顺、大连、奉天等地进行大规模暴动。外务省在报告结尾处指出，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德国、英国、法国、希腊、美国、古巴等地的共产党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声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活动。日本将中国国内红军的活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分析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

综上，在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情报调查中，日本对于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关系的认识逐渐明晰。日本最终认识到红军在苏俄及共产国际协助下，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并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

二、关于红军与中共关系的调查研究

红军成军之后，由于其活动隐秘、情报来源有

限,起初日本方面不仅难以厘清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甚至无法辨明红军同中共、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隶属关系以及红军的领导权归属等问题。为此,日本外务省与驻华领事馆展开数次调查,拓宽情报搜集渠道,逐步探明了红军与中共的内在联系。

1930年4月4日,外务省经由长沙领事馆情报获悉,中共在上海以“互济会”名义为红军招募救护队宣传员,计划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选拔100名(考试地点上海),从“满洲”、直隶、山东、山西、陕西选拔100名(考试地点天津),从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河南选拔100名(考试地点汉口),从广东、广西、云南、香港选拔100名(考试地点香港),录取后直接派往两广、两湖、福建及江西各省红军内部工作。^②中共在国统区为红军募员,引起日本对二者关系的警觉和关注。

上海总领事馆截获两份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与红军相关的公文,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告工农群众书》。^③8月8日,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转送了这两份资料的日译版,并汇报了红军的近况。重光葵在报告中首次提及并分析了红军、中共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三者的关系。^④报告指出,7月中旬长沙事件爆发,中共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告,评述红军的作战计划及红军的战事进展,目的是为了将党员的革命斗志推向高潮,同时达到宣传红军的效果;中共早先就将宣传员及医务人员派往红军内部指导工作;5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又有数名红军代表参加。重光葵认为红军与中共实质上是志趣相投、一脉相承的。^⑤

论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红军的关系时,重光葵持否定意见,认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尚无法节制全部红军。他在报告中表示,发布通电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党内的军事工作委员会并无任何对等关系,日本应将二者视为完全不同的机构,虽然中共军事工作委员会属于上级组织,但是明显没有驾驭全部红军的实力;中共军事工作委员会与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二者是互相利用、互相策应的关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是红军内部的统制机关,实际上只不过是红军主力一朱毛红军(红军第四军)及红军第三、八、十一军的总指挥机构,没有节制全部红军及工农武装的实力;但是,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将随着中共的持续策动而获得相应程度的发展。因此,重光葵呼吁外务省密切关注红军、中共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三者关系变化以及发展态势。^⑥

然而,在8月22日上海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支那共产军及苏维埃区域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前述三者关系的分析,不仅未有任何呈现,反而在质疑红军与中共之间关系的紧密性。^⑦

该报告围绕红军的性质展开,指出“红军与苏俄的赤色军、赤卫军相同,是在将来革命即将成功之时能够承担起保卫共产主义国家的职责、成为国家的正规军队”,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报告认为“中国红军充其量是一支游击队伍,战斗方法也大都遵循游击队特质,尚不能算作是一支正规化军队”。在“红军与中共的关系本身并不密切”的论调下,该报告回溯了红军产生的历史,结合“李立三路线”分析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活动,推演出中共与红军“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关系状态。

该报告认为,“红军并非完全依靠中共的力量组织而成。红军建军的兵源基础是因武汉国民政府的国共分裂政策而兵变的部队,并非由中共自身努力发展而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军阀派系争斗的政治生态,则是产生红军的根本性社会条件。然而,中共又掌握红军的绝对领导权,能够统一调度军队各部。中共为实现革命理想,引导红军的军事行动向革命目标迈进”。上海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提到,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红军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一省或是几省的革命高潮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极其有效的”理论,此后中共一直坚持利用红军在中国几省、至少一省实现完全占领并迅速将其苏维埃化的策略。但上海总领事馆认为,中共领导层内部关于“一省或几省进行苏维埃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分歧,暂时无法估量这一理论的政治化形态及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上海总领事馆在报

告中梳理了“李立三路线”的内容及确立过程^⑤,并援引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评述。^⑥

上海总领事馆判断,红军的目標并非“首先在一省实现完全占领后,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向四周延伸势力,将革命之火燃烧至全国”,且根据决议中“对于一省的完全占领时而有之,只是全国工作的开始”的论调分析,认为“倘若得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意义并不重要,那么红军从一开始就有革命不彻底之嫌”。

基于上述调查,上海总领事馆在《支那共产军及苏维埃区域情况》中认为,“中国红军的活動从实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与封建军阀并无二致的游击队伍,并且深受来自第三国际的施压和批评,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红军又必须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框架内行动,不能节外生枝。当然这也是红军得以立足之根本”。

“李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错误间接为日本认识红军造成些许迷惑和误导。然而,上海总领事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即使二者关系并不密切,中共也依然对红军寄予厚望”。^⑦因此,这份报告向外务省呈现出红军与中共的关系是一副“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特殊形态。

日本认识到红军与中共关系的重要性。一部分领事馆也在日常报告中,陆续提及红军与中共关系问题,并指出,目前红军在中国国内活动区域广泛,且活动频繁;中共与红军力主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致使经济、政治出现无政府状态,导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而日本与中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不能“隔岸观火”,难以“全身而退”。外务省责令各驻华领事馆继续详查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并要求各领事馆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尽可能涉及该项内容。其间,9月12日广东总领事馆的调查报告^⑧与26日宜昌领事馆的调查报告^⑨中,涉及红军与中共关系的内容空缺。随后,其他领事馆加紧情报搜集步伐,对红军与中共的内在联系展开深入调查。

9月30日,汕头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调查报告直接指明中共是红军与地方武装的领导中枢和联络枢纽。报告首先就“中共及红军与地方武装的联络

之经过”论述道,“(国民党)清党前后至今,杨雪如、郑兴、李一啸、宋青、陈士珍、詹自勇、陈海云、方凤巢、何石、陈魁亚、杨石、刘琴西、古大存等以中共党员身份在农民武装组织中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他们加强同共产党各派系及左派农民协会联络,积极宣传并从事反抗国民党的活动”。报告认为,北伐的成功是中共及红军与地方武装走向联合的重要因素,“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增派地方警备力量”,致使国民党新军阀同红军及地方农民武装之间矛盾加剧,“例如,海陆丰的彭湃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相继与军阀激战,并积极准备对策,应对国民党军警讨伐”。

其次,论及“中共领导红军及地方武装进行革命活动”时,报告指出,“本馆情报显示,1930年5月25日,国民党在汕头全市范围内逮捕共产党时,搜查出大批公文,其中发现一份共产党近期工作计划。在该工作计划中,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党部指示,当地共产党员准备于5月28日,配合已占据大埔县高陂的闽西地方武装,乘驻防军防守薄弱之机,进攻汕头市警察局及其他政府机关,驻扎丰顺县的红军第十一军古大存部负责从外围接应”。汕头领事馆由此认为,中共负责联系地方武装与红军,制定暴动计划,指导具体实施。同时,汕头领事馆查明中共在汕头市内散布传单时所用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而当地政府缴获的印章、旗帜、文书等显示潮梅地方武装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关系紧密,直接受特别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领导。^⑩

汕头领事馆的报告向外务省证实红军由中共直接领导,并在中共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收编地方武装,发展自身力量,同时中共又依靠红军发起武装暴动,点燃革命火种。

10月31日,汉口总领事馆综合相关情报,向外务省提交《共产匪及苏维埃政权建设状况》调查报告,其中阐述了中共确立和实现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方式。报告认为“绝大部分的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指挥和领导”,并指出,中共为节制部队的行动,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向红军派驻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将全国分为五大军区,每区设指挥员1名,又在各区内设置3-5个分区,目前全国共有24个分区,且各分区主任由中共党员或是已经入党的红

军负责人担任；中共成立红军训练所、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等机构，培养红军干部，努力将红军塑造成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的专属军队。此外，汉口总领事馆特别强调“中共与中国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终将领导和依靠红军完成推翻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任务”。^④

汉口总领事桑岛主计在这份调查报告基础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广罗情报，于12月再次向外务省提交了长达437页的《中南支地方共产党及共产匪行动状况调查报告书》，对中共确立和实现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作了进一步补充。报告指出，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共产党的策动之下，贺龙、叶挺、朱德的三支部队发起“兵变”、占领南昌，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府，这从根本上说明红军在早期建军时就与中共密不可分；之后，各地的红军依据中共指令进行组编，并由中共统一确立部队番号；中共向红军指派党代表及政治委员，负责监督红军的行动，目的是使红军的行动更加符合中共的策略；红军在苏维埃政府成立期间，直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受中共直接领导，并根据中共指令行动；红军在军事行动上的方针、政治及经济上的基本政策等诸多重要方面，均需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而日常游击战、运动战等相关战术策略等则可听从军长的意见。^⑤根据汉口总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日本已清楚认识到中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随后，天津总领事馆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该情报显示，1931年6月7日，中共顺直委员会基于中央通告中“向普通党员公开红军组织”的要求，印制标注有“中央公布军事委员会订定”字样的《红军组织法》，向当地赤色团体组织及党员进行分发。^⑥6月10日，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递交了关于红军组织法的报告。日本遂由此知晓红军中政治委员的设置及党员民主生活的开展情况。天津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在连、营、团、师、军各级设有政治委员，排一级设小组委员；军官由士官选举产生，在训练及作战期间，士官需绝对服从军官的命令，但在政治生活会上，士官与军官均具备党员资格，二者地位平等。这份情报使日本对中共“支部建在连上”的理论有了一定认知。

随着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调查的不断深入，相较于1930年8月的调查结论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对红军与中共关系的认识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化，揭开重重面纱后，逐渐清晰和明朗。一部分领事馆在后续报告中研究和论述了中共发展红军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1931年11月，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湖南地区共产党及共产匪组成及活动状况》调查报告。^④报告回顾了中共成立红军的历史背景，剖析了中共组建红军的客观原因，当谈及红军与中共关系时，一改过去认为红军与中共关系并不密切的论调，坚持认为“共产党与红军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该报告指出，“中共早期巩固党和发展党时，深感武力之必要，特别是国共分裂后，加倍努力整备精锐部队。中共深入到群众中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群众内部产生裂变，然后自发从内部寻求突破。在此策略下，中共尝试依靠武力来完成中国的‘赤化’运动。随着党组织活动不断遭受挫折，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士就此达成共识。事实上，中共自始至终不断努力，以掀起全国革命。在革命大潮中，中共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成立属于共产者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充分巩固革命基础。同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正规军持续进行政治诱降，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兵变。红军以游击战术击败国民党部队，并不断夺取其地盘。中共党员及党组织不断努力发展红军，现在尚无证据显示中共是否同时也在红军内部进行党的扩张。但是，中共在已‘赤化’的区域内付出巨大牺牲，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过去的事实已然证明倘若没有军队的支持，仅凭党部是无法实现革命目标的。因此，只有军队、党部相互配合、精诚协作才能最终达成革命目的”。^⑤

长沙领事馆详细论证了中共组建红军的必要性，肯定了中共依靠红军发展红色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方面的巨大贡献，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与红军互为一体、通力合作是最终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日本对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已有了明确、清楚的认识。

此后，随着中共对红军政策宣传的公开化，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不再质疑红军与中共的关系，

不再仅凭推测与主观臆断雾里看花,而统一援引中共中央通告及中共编纂的红军出版物,如《中国共产党为各省红军的胜利告劳苦大众书》^④、《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略》^⑤等,认定红军与中共水乳交融、守望相助、互为一体。

三、关于红军军事活动及武器装备特征的研究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详细分析红军战术特点、作战策略及方针政策等,预估红军的战力水平及其政治影响力。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收编“土匪”、策反敌军士兵是中共与红军的军事策略之一。关于红军编制,外务省情报显示,截至1930年4月,红军14个军整体兵力合计为66620人,其中贫农占58.5%、军人占27.5%、工人占3.5%、“流氓及土匪”占10.5%。^⑥红军中“流氓及土匪”成分的士兵已占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且各军“土匪”的占比不尽相同,例如,李明光第六军及古大存第十一军中“土匪”占比已超40%。^⑦1928年4月,广东总领事馆曾搜集到由周其鉴、赵自选、朱德联合署名的《北江各县暴动工作纲领》。根据该文件所述,中共既有意识地利用“土匪”破坏敌方交通,又伺机从其内部分化瓦解,后将其收编以扩充红军兵力。^⑧收编“土匪”扩红是中共及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效方策。与此同时,中共与红军策反国民党士兵,并劝导其参加红军。1929年4月4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撤退至长汀后,拟由闽赣边界向北转移,并称“有情报显示,驻扎漳州的第一师及当地海军原属蒋介石派系,因红军策动,现乘宁汉决裂之际起事倒戈”。^⑨1930年3月31日,宜昌领事馆领事代理浦川昌义向外务省报送沙市下游红军第六军情报,在“策略”部分指出,红军第六军在军长孙德清带领下,“放手发动农民、青年,策反国军士兵,夺取地方团武署,扩充军队”。^⑩4月14日,浦川昌义向外务省报告贺龙部队情报,指出“鹤峰地区红军第四军辖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沿途收编大量土匪”。^⑪同时期,厦门领事馆也向外务省报告,为进攻汝城,当地红军与长乐、平邑一带的“土匪”联合策划暴动。^⑫日本福冈县府调

查员在天津搜集情报时获悉,平津冀地区“土匪”头目马得九拥护中共的合作政策,率部千余人接受整编,扩充至红军队伍。^⑬由此可见,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较早就将目光投向中共与红军对叛兵及“土匪”的策略之上,关注红军扩红。

收编和利用“土匪”问题相对复杂,关乎日本对红军性质的认定与判断。日本政府责令相关机构继续深入调查其背后有无中共相应的制度支持,查清红军与“土匪”的关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重光葵详查这一问题后,于1930年5月21日向外务省提交了《南支方面共产军状况》调查报告。他对中共是否有相应政策及相关制度是否完备表示怀疑,认为“此举只是中共为红军扩军而进行的一种虚张声势的宣传”。报告指出,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及农民起义遭到国民政府镇压,红军进攻城市的军事战略严重受挫,中共于1928年春进行土地革命。广州起义后,中共以海陆丰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逐步将“土匪”“农匪”^⑭置于中共的统制之下收编改组为红军。中共曾向江西修水、湖北通城、湖南平江地区的根据地派驻宣传员,宣传“赤化”思想及政策方针,一概宣称已经完全掌握此类“土匪”“农匪”的领导权,并成功改编为红军。重光葵表示“当前仍无法明确红军同‘不逞团’之间是否已经完成制度性衔接与统制”^⑮,且更倾向于认为是红军与“土匪”在宣传方面的互相利用,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势力。^⑯

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起义。日本担心红军与“土匪”走向联合进而引发全国性“暴乱”。针对红军与“土匪”关系及“土匪共产化”问题,上海总领事馆再度进行了深入调查。上海总领事馆调查认为,各地名义上所谓的红军,其实际主体仍是“土匪”,且随着暴动的持续,“土匪”大增,政府的正规军或是逃兵叛兵为谋生计加入“土匪”,也使“土匪”势力不断扩大进而涌向城市近郊。例如,河南、山东一带的红枪会,起初为生活所迫以求自保被收编为红军,目前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近年来,南方各省内诸如此类“土匪共产化”的现象日趋增多。他们主张消灭地主劣绅、抵制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宗教,与红军的实际行动极为相像。就“土匪共

产化”实现路径而言,上海总领事馆指出,一些同南京国民政府决裂、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共产分子”渗透至“土匪”队伍中,从内部寻求突破口进行改造,构筑并强化红军与“土匪”的联络关系,最终实现“土匪共产化”。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产分子”成功组织农民自卫军,得益于坚持吸收“土匪”策略,而红军在南方得以显著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土匪”策反的成功。上海总领事馆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认为唯有蒋介石取得胜利,彻底整顿国民政府,全力镇压他们^⑧,才能扭转当前局势。同时,上海总领事馆在报告中,十分担忧“土匪共产化”后红军力量过分壮大最终导致中国爆发与俄国类似的共产革命,建议日本政府呼应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配合西方列强的步调,积极在国际间营造“对中强硬”“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氛围。^⑨日本政府随之调整政策,向西方列强开放中共与红军的情报,密切关注红军收编“土匪”后的发展趋势。1931年12月,外务省经日本驻外使领馆向英国、美国、法国等通报红军情报,指出“长江一带水害过后,仅武汉一地就有十几万难民涌入。红军与‘土匪’纷纷现身。‘共产分子’积极策动难民造反。鄂北贺龙部、鄂东旷继勋部、鄂西段德昌部等彼此接应、相互配合,密谋攻取武汉”。^⑩日本向外国开放有关中共与红军的情报,试图巩固其作为远东反共代言人、桥头堡的国际地位。

关于红军与“土匪”及“土匪共产化”问题,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及情报中尚存罅漏,包括“土匪”占比及“土匪”改造问题。中共以收编、改造、清洗方式,解决红军中“土匪成分”问题。^⑪土匪在军中的占比是浮动变化的,1931年下降至8.75%。^⑫红军创建初期、中共六大及1931年后,红军对待性质不同的“土匪”,采取的政策也大有不同。^⑬红军正规化后,“土匪成分”早已褪去了。因此,日方调查中缺乏对中共“土匪”政策演变的搜集与分析,其中有关“土匪”比重的数据尚待进一步佐证。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切断交通及通信、发动奇袭是红军采用的常规战术之一。1930年2月27日,长沙领事馆搜集到红军在湖南省内军事行动的情报后,立即向外务省报告。对于红军战术,报

告指出,湘西红军在贺龙领导下与周朝武部队合并后,兵力倍增,时常借助天险、采用奇袭方式,在湘鄂赣、湘川黔边界开展军事活动;彭德怀部1000余人采用奇袭方式攻陷浏阳县城,解除当地兵团武装后,转移至萍乡以外的安关山附近。^⑭7月15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占领岳州城陵矶,红军故技重施,作战方式如出一辙。报告中称,这支部队由贺龙部、彭德怀及黄公略部组成,经崇阳羊楼洞南下,沿途拆除电线、铁轨,切断交通,趁岳州城防守薄弱之际,发起突袭,一举占领城郭。^⑮

1932年3月21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赣东、鄂东南红军的情况。报告指出,黄陂、黄安的红军孔荷宠部进攻平汉线南段孝感、花园时,孔荷宠率部1000余人突袭杨家寨,沿途捣毁铁道、切断通信线路,炸断杨家寨南铁桥,致使平汉铁路线一时停运。^⑯随后,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徐向前部、旷继勋部战况时,阐述了近乎相同的战术及作战方式。徐向前的第四军占领鄂东广济后,于次日晚趁夜奇袭蕲水;鄂北罗田、麻城、黄安方面,旷继勋的第六军奇袭孝感,分两次捣毁平汉线王家店至杨家寨段铁道。^⑰关于红军采用切断交通及通信、发起奇袭的战术,除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外,在5月20日外务省亚细亚局编辑的《近期中国共产运动概况》中也有相同论述。文中言及赣南朱毛红军的作战动态时指出,朱毛红军抓住战机,先发制人,于4月10日突袭龙岩,以破竹之势迅速攻下安溪以西至云霄一带,占据闽南,不日即将合围厦门。^⑱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红军攻城后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占据政府机关、释放在押犯人、没收资本家财产、宣传革命思想等。1930年2月27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近期红军军事活动时称,红军约1000人由崇阳进入湖北,渡过汀泗桥,驻扎于白丁铺一带,红军有序收缴当地守军的枪械弹药,扣押并没收资本家财产。^⑲7月4日,福州领事馆报告闽粤边界红军情报时指出,闽西南部红军与香翰屏部队在潮州东门外竹高山发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红军撤退至松口、丰稔一带后,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以打倒反动派名义,没收了当地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⑳

7月15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递交调查报告,更加详细地说明了红军攻城后的措施及实施情况。攻陷岳州城后,红军先头部队约200人立即入城占领政府机关及各重要机构,扣押相关人员,释放监狱囚犯。随后,红军主力部队约2000人抵达。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入驻城内的大通旅馆。红军士兵在城内各处张贴布告,包括署名为第五军第五纵队司令李臻、政治委员邓乾元的布告,署名为第八军工农委员会常务委员李臻、邓乾元、何长工的布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的布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第一纵队部政治主任于兆龙、第三纵队政治主任刘宗义的布告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团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布告。红军宣传员向群众散发宣传单,发表街头演讲,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此外,长沙领事馆在报告中进一步叙述道:“红军打击中产阶级、大资本家及地主,从不侵犯劳苦百姓的利益;红军烧毁岳州县第一二厘金局,捣毁县政府、财政局、公安局、法院等机关,释放犯人,带领人民群众搬运各机关内的什器物品,分发给劳苦大众使用。”^②

芜湖领事柴崎白尾向外务省报送安徽省内红军情报时指出,红军方志敏及邵式平部约2000人进攻省南部秋浦、昭泽、中林,占领龙泉湾镇后,在城镇各处悬挂红旗,释放监狱犯人,没收了约80户资本家商铺。^③

对红军实施上述措施背后的真实意图,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时,曾作简要分析。汉口总领事馆指出,以红军第二十军为例,李云秀领导部队在江西萍乡一带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平分地权,真正原因在于中共与红军主张一律消灭土豪劣绅、资本家、政府官僚及国民党军阀等敌人;中共与红军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要求驱逐外国传教士,拆毁与外国人有关的庙宇、祠堂,拆除天主教堂,取缔福音、圣功等教会组织及与其相关的善堂、医院等机构,与中国人有关的则全部没收为苏维埃政府公有财产,充作中共党支部、农民协会、总工会等的办公场所。^④此外,厦门领事馆也曾指出,红军张贴共产党十大政策、共产党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宣言等布告,根本目的在于使民众知晓并理解中共与红军的政策和纲

领。^⑤由上述可见,“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资本家财产、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斗、工作、宣传的具体体现,在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中也可得到印证。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非常关注红军武器弹药问题,极尽所能调查各地红军的实际状况,向日本政府提供评估红军整体作战能力的参考依据。厦门领事馆领事寺嶋广文在朱毛红军进攻长汀时,广布情报网络,调查该军的兵力与武器弹药情况。1929年4月4日,寺嶋广文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报告时指出,目前朱毛红军中兵员数目与武器弹药数量的比例严重失衡,且武器弹药极其匮乏。据他推测,朱毛红军尚属红军中较有实力的部队,其他部队的实际状况可能更为严峻。^⑥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统计的红军总人数及枪支数量具备一定的参照价值。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曾统计红军兵力,当时红军共有13个军,分布于8省127个县,约62700余人、38900多支枪。^⑦

1930年5月21日,上海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南支”方面红军调查报告^⑧,其中“中国共产军编制概要(1930年4月迄)”显示,红军14个军总兵力66620人,共有步枪16520支、机枪646支、手枪5530支、迫击炮105门、大炮75门、飞机5架。^⑨士兵枪支比约为1:0.25。^⑩同时期,受外务省情报部直接委派,波多野乾一展开对中共的调查。^⑪波多野乾一认为,截至1930年4月,红军实际共有12个军和1个独立团,第十五军至第二十一军的存在仅是中共的口头宣传。波多野乾一推测红军总兵力约75000人,保有枪械数约40000-50000支。^⑫若全部以步枪数量计算,波多野乾一调查的红军士兵枪支比大致在1:0.53至1:0.67之间,比上海总领事馆的数据结果略高。半年之后,长沙领事馆针对红军兵力进行了一次独立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红军14个军共66480人,拥有步枪46520支、机关枪646支、短枪5530支、大炮75门、迫击炮105门。^⑬其中红军总兵力和总步枪数的统计数据分别与上海总领事馆和波多野乾一的数据相近。根据长沙领事馆的调查结果,当时红军士兵枪支比为1:0.69。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反映红军各军兵力存在地域性差异,在红军力量相对雄厚的地区士兵枪支比率略高。同时,国民党的“围剿”也给红军兵力增减及武器消耗带来很大影响。例如,1930年8月26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闽西地区红军情报,闽西红军由3个团扩增至5个团,总兵力达4700人、步枪3050支。^④士兵枪支比为1:0.64,远高于上海总领事馆调查的平均水平。上述兵力在雁石、大埔的“围剿”战斗中折损大半,原先的5个团整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一至第五纵队,总兵力减少至3000人、枪2000支,且平均每枪仅有子弹23发。虽总兵力有所减少,整编后士兵枪支比却略微提升,接近长沙领事馆调查的平均水平。1931年4月16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江西省内红军情况。江西省内有红军第三军至第十二军、二十二军、第三军预备队、第十六军第七、八、九师,总兵力达73100人、步枪39300支。^⑤江西省内红军士兵枪支比为1:0.57,虽总兵力因扩军有显著增加,而枪支弹药增幅仍较为微弱。

湖北省内红军经历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战斗后大力扩红,导致总兵力与枪支弹药之间的比例失衡更为严重,士兵枪支比明显低于1930年度红军平均水平。1932年2月20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汇报湖北省内红军情况。当时,湖北省内有红军第二军贺龙部、红军第一军许继慎部、第十一军吴光浩部、独立第四师李灿部、第十四军贺文慈部、第十六军孔荷宠部、第十八军胡筠部、第十九军侯奇部及第二十一军段德昌部,总兵力约16.3万人,步枪5.2万支。士兵枪支比仅为1:0.32。

汉口总领事馆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尽管如此,相比红军,同时期的湖北赤卫队几乎没有枪支,武器为大刀、长矛、梭镖、棍棒等,仅赤卫队一分队有步枪3、4支、手枪1、2支,且主要由农民、工人组成,平均每县约一两千人。赤卫队作为红军的后备力量,相较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可言。^⑥

据部分领事馆调查,发展赤卫队,武装工农群众,为红军迅速扩充兵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严重匮乏武器枪械。1930年8月26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闽西红军发展赤卫队的情况。报告指出,朱

毛红军在闽西各县群众中组织赤卫队、暴动队^⑦,发展工农武装,规定“男女16岁以上23岁以下组成赤卫队,24岁以上至40岁以下组成暴动队,6、7岁以上至16岁以下组成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此外,其他青年妇女组成妇女协会”。针对工农武装的训练方式,厦门领事馆在报告中称,赤卫队在各乡设置数个班,每月各班之间轮替交换训练,早晚进行2次射击演练;暴动队负责演练发动武装暴动,每月进行2、3次训练;青年妇女每月进行4、5次训练;儿童团及少年先锋队以练习游行为主,每日进行1、2次训练。^⑧汕头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潮梅、海陆丰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展情况也与此相同。^⑨赤卫队及工农武装接受中共与红军的直接领导和训练,为配合红军作战及后期编入正规军奠定了基础。驻华领事馆相关报告中就曾提到,赤卫队等工农武装的主要任务即是策应和协助红军游击队开展战斗。^⑩1930年9月5日,厦门领事馆对闽西游击队及赤卫队展开调查,当时龙岩、永定、上杭、漳平共有红军游击队员2160人,配合游击队作战的赤卫队达上万人,而赤卫队大都使用镰刀、棍棒等木质武器,没有常规枪械,缺乏武器弹药,战斗力十分有限。^⑪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情报显示,红军武器质量堪忧,多方筹措军火。1930年10月24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二十军情况时指出,目前红军所使用的轻武器^⑫主要是由军队内部苏俄及印度籍技术人员制造的小型炮,该炮射击威力较弱,做工略为粗糙,炮身易裂、口径宽大且体积笨重。红军正在对外招聘数名德国、苏俄技术人员,拟将重心置于制造轻型机枪、步枪及弹药之上。^⑬1931年7月11日,汕头领事馆领事务代理户根木长之助致电外务省,建议“严查红军进出口武器问题”,他在电文中称,红军严重缺乏子弹,每枪不过3-5发,士兵只能手持空枪,且子弹质量低劣,为士兵徒手改造。^⑭朝鲜总督府的情报就曾指出,红军与日本人野口、酒井等计划在长崎成立空壳公司,专门负责采购军火。^⑮日本一方面在其国内严查与红军购置武器相关的所有活动,一方面试图摸清红军武器调度的详情。汕头领事馆经过调查、搜集情报,了解到红军武器购置的方式和渠道。汕头领事馆立即向外务省报告。该

报告称,红军方面派人假扮成商人,潜伏在上海、香港,订购子弹制造的器械。器械到货以后,就立即将其拆卸、分装。为逃脱官方检查,他们把零件分别装进大小不同的圆桶之中。5月上旬,汕头方面借调民船,将这些满载零件的圆桶运输至大埔县虎市。5月17日,红军佯装进攻虎市,实则是为接收这批物资。得手之后,红军又把这批物资分成40余担进行搬运,秘密经永定、白沙、长汀,最终运送至江西。汕头领事馆又另外获悉,红军之前从上海采购了一批制造武器所用的基础材料,仍未运达,红军方面担心转运途中遭遇风险,特派专人暗藏在汕头港口负责接应。^⑤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根据情报预判红军将向东北、陕甘地区转移。1930年12月24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11月抚顺警察署逮捕陈士真、李得禄、赵金山等29名中共党员一事。^⑥日本就此获悉中共拟在东北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计划,清楚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体系以及中共满洲行动委员会的基本情况。1931年1月31日,林久治郎再次致电币原喜重郎表示,已查明该暴动计划有朝鲜籍共产党员郑炳春等参与,截获包括中共中央通告在内的各类宣传印刷品49种、杂志1种及地图4张等。^⑦日本判断中共有可能引导红军转移至东北,进一步联合朝鲜与苏俄。日本唯恐中共及红军力量在东北的壮大危及其“满蒙权益”。因此,阻断红军向东北转移、防止中共“赤化满洲”,成为日本之后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重要考量和诱因之一。

1932年11月6日,汉口总领事馆根据情报得知,红军旷继勋、徐向前部与段德昌、贺龙、王泰部汇合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河南南部向西行进,一路沿延安、南漳、保康、竹山向西行进,预计将最终进入陕西。^⑧汉口总领事馆认为,陕西一带中央军力量薄弱,红军入陕后可能继续向甘肃、青海方面挺进,以获得苏俄的军费支持和武器供应,然后,再度回师湖北、湖南。汉口总领事馆立即将此分析呈报外务省。12月13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致电汉口总领事清水八百一,责令调查陕甘地区红军情况,并查明近期由湖北运至陕甘的棉纱布及金属物资数量激增是

否与红军有关。^⑨17日,清水八百一在回电中指出,红军徐向前部目前行进至陕西南部城固、郑南一带,贺龙部进入陕西南部顺阳地区,两军转移至陕西的原因是当地警备力量薄弱,且可获得苏俄援助,今后有可能将甘肃作为革命根据地,湖北地区的红军也有可能向西北地区转移。棉织、金属物资的增加与红军并无关联,皆因地方商人恐红军撤退导致交通受阻而提前囤货所致。同月22日,清水八百一再度致电内田康哉,汇报红军主力部队进入陕西的情况。^⑩外务省随后向日本驻瑞士、美国大使通报近期红军活动情况。^⑪外务省从中共在陕甘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设甘陕苏维埃政权三方面判断,中共将在该地区组建革命委员会以及红军第二十六军,并认为红军大有向陕甘地区转移之趋势。外务省无法断定此举是否属于中共与红军实施“北支赤化计划”的一部分,责令相关领事馆继续跟进事态发展。^⑫

四、日本外务省与驻华领事馆有关红军的情报来源及特点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是日本搜集侵华情报的重要机构。据日本政府公布的《在外公馆一览表》所示,截至1931年3月,日本在华共设有51个领事机构,其中“南支那”27个、“北支那”23个,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则被单列于“亚细亚、南洋”一览内。^⑬

1928至1932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展开全面考察,形成了大量调查报告,为日本掌握红军动态、预判红军动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广泛搜集红军信息,情报来源渠道呈现多元化的显著特征。

其一,利用中国人搜集情报。1930年8月12日,上海总领事馆领事代理重光葵向外务省提交“南支”红军的相关情报,实际上是由中国人冯攸所提供。^⑭冯攸为浙江宁波人,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日语非常流利,且无任何政治倾向,被日本视作胜任谍报工作的不二人选。冯攸与日本领事馆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保持联系。冯攸将搜集到的红军情报经隐秘渠道交付领事馆事务官,再由事务官呈报领事。为收买和利用部分中国人搜集情报,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不惜豪掷重金。1932年3月16日,吉林总领事石

射猪太郎致电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就曾报告一次性向中国籍、朝鲜籍情报人员给付450圆以示犒劳,向中国籍某宪兵给付情报佣金500圆以表酬谢。^⑩

其二,密切关注中外文新闻报道。红军活动多处于偏远山区或几省交界,加之不断被国民党“围剿”,日本获取红军情报直面诸多困难。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广罗中文报刊中有关红军消息,同时也倾力筛查英文、俄文以及日文报刊中有关红军的记述,借机窥视英、美、苏等国对红军及中国革命的态度,从而为日本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例如,1930年7月下旬长沙事件爆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曾密切关注英国态度以及英文报刊对该事件的评论。最终香港总领事馆判断英国政府极有可能以自卫或发起国际赔偿等方式保护英国国民。香港总领事馆将该结论呈报外务省后,日本政府对“扬子江流域的暴动”采取了暂且观望的策略。^⑪此外,日本曾一度担心中共、红军与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可能走向合作。1930年8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将汪精卫刊登在中文报刊上的谈话翻译后呈送外务省,后又查到红军机关报中有“打倒英国走狗蒋介石、打倒日本走狗张学良、打倒美国走狗汪精卫”等字样。^⑫日本才就此放心,断定二者并无关系。

外国传教士也是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情报来源的重要提供者。1930年10月4日,彭德怀率部进攻江西吉安,大有向省会南昌压进之势。当地12名外国传教士集体逃往上海。其中,一名叫做约翰逊的传教士向日本上海总领事馆密报,彭德怀部约700-800人潜伏在樟树镇附近,与国民党部队进行迂回作战。^⑬1932年6月2日,某外国传教士向汉口领事馆密报红军旷继勋部在皖豫交界处的行军踪迹。^⑭该传教士原是由安徽六安前往汉口躲避战乱。传教士向日本提供情报,一方面出于避战心理,另一方面也与红军针对传教士的驱逐政策有关。^⑮但也有部分外国传教士跟随红军^⑯,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除上述情报来源渠道之外,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密切关注国民政府发布的“围剿”计划、清乡计划以及公文公告,国民党党部、军队及各级行政部门、各地方绥靖公署的来往电报,力求从“围剿”战略

的一方来管窥红军的行踪及活动。与此同时,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也倾尽所能搜集中共方面有关红军的布告、告示、通电及传单、宣传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纂的资料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革命委员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各左翼协会发布的通知、文告等。此外,在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有关红军的情报资料中,也有以中国人撰写的调查资料^⑰和日本人编写的研究资料^⑱为蓝本编纂而成的调查报告。

就参与情报搜集的部门机构而言,这一时期内,除外务省以外,参与红军情报调查的主要有日本驻沙市(1928年)^⑲、宜昌(1930年)、福州(1930年)、厦门(1929年)、汕头(1928年)、苏州(1928年)、上海(1928年)、芜湖(1930年)、九江(1928年)、北平(1928年)、云南(1930年)、香港(1930年)、重庆(1930年)、成都(1930年)、张店(1929年)、天津(1930年)、汉口(1929年)、广东(1928年)、长沙(1931年)、南京(1931年)、间岛(1931年)、郑州(1931年)、吉林(1931年)、济南(1932年)、杭州(1932年)领事馆以及关东厅警务局(1931年)等。

就调查的时间段及内容特点来看,1928年至1929年,外务省及个别领事馆仅有零星报告,且多散见于汇报有关中共革命活动的外交函电中。1930年开始,日本驻中国南方的大部分领事馆普遍展开针对红军的调查、情报搜集工作。1931年,日本驻中国北方的部分领事馆也加入到情报调查、搜集工作中,且集中探查中共及红军同苏俄之间联系的详情。1932年,日本驻汉口、九江两个领事馆一跃成为日本外务省关于红军军事情报的主要来源。日本开始关注陕甘地区的红军活动,着手分析红军向陕甘方面转移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总体来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收集到的红军情报种类繁多、内容细致,调查报告涉及各地区红军各军兵力、人员构成、兵源成分、政治与军事训练科目、武器状况、编制情况、军事动向,甚至包括赤卫队、游击队以及红军救援队宣传员招募情况等。

但是,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关于红军的情报、调查报告仍有相当程度的缺陷。例如,日本驻华领事馆利用报刊、国民政府要员的谈话等来探知红军动向,本身具有一定滞后性,缺乏时效性。日本无

法第一时间掌握红军具体军事动作,待摸清实际情况后,可能已距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过去数日、数月或更久。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情报来源渠道颇多、情报内容繁杂,其中不乏一些由穿插在社会底层民众中的眼线所提供的虚张声势、夸大其词的谣言,这些充斥着谣言的情报与客观实际并不相符,^⑤尚需进一步筛选、推敲和核实。再者,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中对早期朱毛红军关注较少,尤其是红军创建及成军初期,这直接导致日本对早期红军主力的认识含混不清。此外,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历次战斗、战役的考察及分析,未能与中共建设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展红色政权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结合起来,且未能从红军作战策略、作战技巧及发动战役背后的意图、意义及影响等角度作细致研判,无法理解红军发动运动战以及在实际战斗中采用的游击战术,对红军的战略转移缺乏敏锐观察,而仅仅解析为是遭遇“围剿”后的“逃跑”“逃窜”。

综上所述,红军草创伊始,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曾迫切搜集有关红军的情报并形成了大量调查报告。解读这些情报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日本侵华的真实意图,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考察红军及红军的活动给日本对华策略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同时,对我们从第三方视角、国际视野探究红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结语

1928年至1932年是中共拥有自己的“枪杆子”——红军后独立走上革命道路的特殊时期。日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这一时期的红军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从国际军事援助的角度调查和剖析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高度关注红军的对外联络,从武装割据的视角认识和解读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又从军事策略、作战方式、士兵武器配比等诸方面全方位调查红军的军事活动及武器装备。通过调查,日本逐步认识到红军的诞生、成长及发展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必然。^⑥

日本密切注视红军发展、调查红军情况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回溯甲午中日战争后至日俄

战争爆发,日本就将俄国视为远东地区的第一强敌,是日本的巨大威胁。十月革命后,沙俄政府垮台。日本尤为警惕和担忧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势力在东亚特别在中国的渗透、发展和蔓延,唯恐危及其国体及天皇统治。随着中共及红军持续发展壮大,日本迅速意识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地区局势的动荡与冲突,且中共及红军才是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真正的敌人。长沙领事馆领事槽谷廉二曾于1930年11月17日向外务省报告,红军问题甚为重要,倘若红军取得成功,中国将被“赤化”成为与苏俄一样的共产国家,中共与红军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不免招致帝国主义列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与之相抗衡,同时也会大大促使帝国主义国家走向联合,共同出兵对付苏俄和中国。^⑦上海总领事馆在《支那共产军及苏维埃区域情况》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红军破坏旧的封建秩序,将导致社会不安定之风高涨^⑧,从而最终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此外,基于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情报,日本关注到红军体察百姓之疾苦,采取“围而不打”、力争和平粉碎国民党“围剿”的战略。1932年1月31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派出情报人员打探武汉周围“围剿”部队的军情及战斗实力,发动工农群众参与斗争,并向农民发放武器,准备合围“围剿”部队,以和平方式解除其武装。汉口总领事馆在报告中认为,目前农村水患严重,红军在政策方面也不愿疲惫的农民继续受苦,因此采取保全城市的做法来平息战争事态,避免与国民党部队交火。^⑨由此可见,红军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军。

然而,红军发展壮大的势头是任何人都无法扼制的,越来越多的遭受压迫的中国民众纷纷拿起武器,参加到中共与红军的革命行伍之中。1930年9月30日,汕头领事馆领事别府熊吉在向外务省呈送的报告中指出,因战事而散落、藏身于深山腹地的士兵,被中共聚集起来整编为红军,并提供后勤补给;地方军费、赋税负担持续加重,地方劣绅借助国民党之势,控制地方党部,把持政府机关,以官府名义欺凌不同政见者以及穷苦农民,焚烧其房屋、剥夺其耕牛、没收其财产,这些民众在中共的感召下,纷纷加入红军;清党前后参加农民协会(左派)的农民、清党

后参加民团及其他自卫团(右派)的“农匪”,一律蒙受剥削、欺压,之后全部投身红军;中学学生毕业后,因生计困难以致升学无望,又受周遭环境逼迫,思想发生蜕变,接连投奔中共与红军。^⑥日本从多方面获得的情报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红军承载了所有受压迫的中国民众用革命方式推翻旧制度的希望。参加红军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最为正确的选择,也是大势所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注释:

①《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220页。

②「序説」、波多野乾一編『資料集成 中国共産党史』第一卷、時事通信社、1970年、13—16頁。

③《1933年全国红军人数统计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287页。

④王美平:《田中内阁“扶蒋反共”政策与蒋日合作(1927—1928)》,《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⑤祁建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对中共的情报调查与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⑥部分日本史料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统称为“共产军”“共产匪”,其中包括红军及赤卫队、游击队、暴动队等工农武装。本文舍弃援引“共产军”等看似笼统,实为蔑视的称谓,在比对史料内容的基础上,对“共产军”的实际所指加以甄别,直接使用红军这一称谓,从而深入考察当时日本对红军的情报调查与研究,如实呈现其中涉及工农武装的部分。

⑦相关研究有祁建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对中共的情报调查与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祁建民:《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调查及对策》,《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⑧相关研究有彭程:《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对红军的认识——以日本馆藏档案为中心》,《世纪桥》2015年第8期;霍耀林:《土地革命初期日本对南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述略》,《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⑨相关研究有阿南友亮「広東東部における「紅軍」の形態、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法学研究』83巻6号、2010年、1—65頁;池田誠「農村革命期における労農紅軍の建設——中国共産党の軍事方針の展開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館法学』

132号、1977年、121—200頁;石川忠雄、平松茂雄「ソヴィエト革命時期における(中国)紅軍の基本的性格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学研究』44巻3号、1977年、427—465頁等。

⑩外務省情報部「支那共産党史」、外務省情報部、1932年。

⑪陸軍省調査班編「支那に於ける共産党の活動」、陸軍省調査班、1932年。

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全十二卷)、勁草書房、1975年。

⑬波多野乾一編『資料集成 中国共産党史』(全八卷)、時事通信社、1970年。

⑭国民党军队,具体番号不详——作者注。

⑮「2. 広東/2 昭和5年4月22日から昭和5年7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8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1/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1 支那ニ於ケル共産軍並ニ蘇維埃区域ノ情況ニ関スル件 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1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甲)/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原文写作广东省,应为笔误。

⑱日方史料中未说明该笔经费为一次性支付或是逐年支付。

⑲「2. 広東/4 昭和5年9月3日から昭和5年9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85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1/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3. 在宜昌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㉑「6. 在汕頭領事館/5 昭和5年9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㉒「1. 一般/2 昭和5年8月21日から乙昭和5年10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59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三巻/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史料中未出现凡人的全名。

㉓「9. 本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24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六巻/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

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外蒙古”的概念演变及其国际定义等问题相对复杂,本文直接引述日方史料中的称谓,仅指国民政府时期无法实际控制的北部蒙古地区。

㉕「1. 在長沙領事館/3 昭和5年11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1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2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㉖「6. 天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2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六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㉗「6. 天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2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六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㉘「1. 本省/1 昭和6年から昭和8年2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4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㉙「1. 在長沙領事館/1 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25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㉚「2. 上海/5 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収録『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発南昌進攻武漢合圍ノ為回電』,根据内容,即《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参见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50页;『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ノ南昌進攻武漢合圍ノタメ工農大衆ニ告ゲ』(《中国革命軍事委員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告工农群众书》)则尚未见到与之对应的中文史料。

㉛笔者目力所及的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调查报告中尚属首次。

㉜「2. 上海/5 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㉝「2. 上海/5 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㉞「1 支那ニ於ケル共產軍並ニ蘇維埃区域ノ情況ニ関スル件 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92031981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甲)/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㉟1930年2月26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发布,一般视为是“李立三路线”的正式确定。《红旗》杂志遂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该路线的理论依据。参见《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資料44『红旗』社論(李立三)一省または数省での政權奪取の勝利の条件をどのように準備するか」、「資料45『红旗』社論(李立三)中国革命と世界革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第四冊、勁草書房、1975年、594—600頁)。

㊱“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是极端错误的”,该处在日方史料中原用日文记载,此处用中文文本进行引述,参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七册,第257—273页。

㊲「1 支那ニ於ケル共產軍並ニ蘇維埃区域ノ情況ニ関スル件 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1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甲)/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㊳「2. 広東/4 昭和5年9月3日から昭和5年9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85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卷の1/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㊴「3. 在宜昌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3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㊵「6. 在汕頭領事館/5 昭和5年9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3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

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1. 漢口/4昭和5年共産匪及「ソヴィエト」政権建設状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8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1/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1. 一般/5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62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三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6. 天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5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2. 長沙/2昭和6年11月 湖南地方ニ於ケル共産党及共産匪ノ組成並活動状況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9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2/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2. 長沙/3昭和6年11月 湖南地方ニ於ケル共産党及共産匪ノ組成並活動状況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9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2/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6. 天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2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六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12. 上海公使及総領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64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2. 上海/4昭和5年3月2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6. 在汕頭領事館/5昭和5年9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2. 広東/1昭和3年3月23日から和5年4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82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1/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省外交史料館)。

⑤「5. 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画像番号第234番目から第235番目まで)、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3. 在宜昌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000(画像番号第202番目から第204番目まで)、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3. 在宜昌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000(画像番号第205番目から第206番目まで)、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5. 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画像番号第261番目から第264番目まで)、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巻(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6. 天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5800(画像番号第126番目から第127番目まで)、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指农民武装。

⑤不逞团是指由“土匪”“农匪”改编而成的部队。

⑤「2. 上海/3昭和4年1月10日から昭和5年3月2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6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指红军及由“土匪”改编而成的红军。

⑤「2. 上海/5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巻/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3. 中国共匪ノ状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0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巻の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张永:《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③《中国当前的政局(1933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④《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400页。

⑤「1.在长沙领事馆/1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25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1.在长沙领事馆/2昭和5年5月10日から昭和5年11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26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2.漢口/2昭和7年3月16日から昭和7年8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2.漢口/2昭和7年3月16日から昭和7年8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⑨「1.本省/1昭和6年から昭和8年2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1.在长沙领事馆/1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25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⑪「4.在福州総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⑫「1.在长沙领事馆/2昭和5年5月10日から昭和5年11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26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⑬「3.蕪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9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⑭「1.漢口/3昭和5年8月13日から昭和5年10月3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79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卷の1/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⑮「9.廈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6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5.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文中仅出现枪支总数，未做步枪、手枪、机枪等具体说明。

⑱「2.上海/3昭和4年1月10日から昭和5年3月2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6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2.上海/3昭和4年1月10日から昭和5年3月2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4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步枪为士兵的主要武器，文中士兵枪支比仅指兵力与步枪的比例，不含手枪、机枪等其他枪械。

㉑波多野乾一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嘱托。“嘱托”在日文中指非正式任命，临时委托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员。参见「中国共産党一九三二年史/1933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0070275600、中国共産党一九三二年史/1933年/情報局/調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凡例”部分。

㉒「紅軍及びソヴィエト」、波多野乾一編「資料集成 中国共産党史」第一卷、283-287頁。

㉓「1.在长沙领事馆/3昭和5年11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1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2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内乱、暴動、騷擾/1項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5.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20319832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2. 長沙/1 昭和 6 年 2 月 24 日から昭和 6 年 11 月 30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96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四卷の2/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㉕「2. 漢口/1 昭和 7 年 1 月 5 日から昭和 7 年 3 月 10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2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㉖暴动队全称“工农暴动队”，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一级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武装组织。参见熊武一、周家法主编《军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9 页。

㉗「5. 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㉘「6. 在汕頭領事館/5 昭和 5 年 9 月 30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7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㉙「5. 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㉚「5. 在厦門領事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32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一卷(乙)/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㉛关于轻武器、小型武器的定义，参见亚历山德拉·布瓦万著，李斌译《共谋及其他规则：国际法与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转让》，朱文奇主编：《国际人道法文选(2005)》，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5-353 页申《关于小型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交易的联合国会议报告》的引述部分。

㉜「1. 漢口/3 昭和 5 年 8 月 13 日から昭和 5 年 10 月 31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879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四卷の1/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㉝「13. 汕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30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六卷/5 目内乱、暴

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㉞「9. 本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24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六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㉟「13. 汕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30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六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㊱「各国共産党關係雜件/中国ノ部/附属物 第一卷 1. 撫順ニ於ケル中国人共産運動者逮捕ニ関スル件 分割 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14300、各国共産党關係雜件/中国ノ部/附属物 第一卷/2 目 要視察人、社会主義者、迴激派其他/5 項 思想事項/4 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㊲「各国共産党關係雜件/中国ノ部/附属物 第一卷 2. 満洲ニ於ケル中国共産党活動状況ニ関スル件 分割 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14500、各国共産党關係雜件/中国ノ部/附属物 第一卷/2 目 要視察人、社会主義者、迴激派其他/5 項 思想事項/4 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㊳「2. 漢口/3 昭和 7 年 8 月 3 日から昭和 7 年 11 月 29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4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㊴「2. 漢口/4 昭和 7 年 12 月 6 日から昭和 8 年 1 月 28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5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㊵「2. 漢口/4 昭和 7 年 12 月 6 日から昭和 8 年 1 月 28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5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㊶「1. 本省/1 昭和 6 年から昭和 8 年 2 月 3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000、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 第七卷/5 目内乱、暴動、騷擾/1 項 支那国/6 類 諸外国内政/A 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㊷「1. 本省/1 昭和 6 年から昭和 8 年 2 月 3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994000、支那各地共匪関

係雑纂 第七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④「1. 本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3020319916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六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⑤「2. 上海/5 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⑥「7. 吉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59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⑦「4. 香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6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三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⑧「16. 北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6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三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⑨「2. 上海/5 昭和5年7月17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4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二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⑩「2. 漢口/2 昭和7年3月16日から昭和7年8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4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⑪「1. 漢口/3 昭和5年8月13日から昭和5年10月3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79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卷の1/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⑫ 参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遵义市委编《遵义会议精神与长征文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63页；齐霁：《参加红军长征的五位外国人》，《军事史林》2006

年8期等。

⑩⑬「1. 在长沙领事馆/3 昭和5年11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1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2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⑭「1. 一般/7 研究資料 第十五 支那赤軍の発展情勢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920319864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三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⑮ 括号内为作者所见史料中该领事馆涉足红军调查的起始年份，后文同。

⑩⑯ 参见「9. 廈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61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八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有关红军谣言的记述。

⑩⑰「2. 长沙/3 昭和6年11月湖南地方ニ於ケル共產党及共產匪ノ組成並活動状況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9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四卷の2/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⑱「1. 在长沙领事馆/3 昭和5年11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1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2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⑲「1 支那ニ於ケル共產軍並ニ蘇維埃区域ノ情况ニ関スル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10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甲)/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⑳「2. 漢口/1 昭和7年1月5日から昭和7年3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942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七卷/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㉑「6. 在汕頭領事館/5 昭和5年9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9837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一卷(乙)/5目 内乱、暴動、騷擾/1項 支那国/6類 諸外国内政/A門 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外交史料館)。